

楚辞读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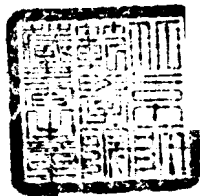
东润题



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

楚辞讲读

朱碧莲



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



21101069

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

1101069

楚辞讲读

朱碧莲

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

(上海中山北路3663号)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华师大印刷厂印刷

开本: 850×1168 1/32 印张: 7.125 字数: 190千字

1986年10月第一版

1986年10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: 1—5000本

统一书号: 10135·027 定价: 1.30元

目 录

楚辞引论·····	(1)
一、楚辞——战国时期楚国出现的新体诗·····	(1)
二、楚辞的代表作家——屈原·····	(3)
三、楚辞的另一位重要作家——宋玉·····	(19)
四、楚辞的其他作家·····	(30)
略评几种有影响的《楚辞》旧注本·····	(32)
一、王逸《楚辞章句》·····	(32)
二、洪兴祖《楚辞补注》·····	(35)
三、朱熹《楚辞集注》·····	(36)
四、王夫之《楚辞通释》·····	(40)
五、蒋驥《山带阁注楚辞》·····	(42)
楚辞作品·····	(45)
屈 原 离骚·····	(45)
九 歌·····	(67)
湘夫人·····	(67)
少司命·····	(71)
河 伯·····	(74)
山 鬼·····	(76)
国 殇·····	(80)
天 问·····	(83)
九 章·····	(108)
涉 江·····	(108)

哀郢·····	(113)
怀沙·····	(121)
惜往日·····	(126)
橘颂·····	(133)
卜居·····	(136)
渔父·····	(140)
招魂·····	(143)
宋 玉 九辩·····	(158)
贾 谊 吊屈原赋·····	(174)
服赋·····	(178)
淮南小山 招隐士·····	(183)
附录 ·····	(186)
司马迁 屈原列传·····	(186)
刘 向 节士篇·····	(194)
王 晋 洞庭山·····	(196)
沈亚之 屈原外传·····	(198)
班 固 离骚序·····	(201)
王 逸 楚辞章句序·····	(204)
离骚经序·····	(209)
刘 勰 辨骚篇·····	(211)
参考书目及部分论文目录索引 ·····	(219)
后记 ·····	(224)

楚辞引论

梁启超曾说：“吾以为凡为中国人者，须获有欣赏楚辞之能力，乃为不虚生此国。”（《饮冰室专集·要籍解题及其读法》）他指出没有欣赏楚辞的能力，即枉为中国人；对中文专业的学生来说，则更应学习楚辞，获得欣赏楚辞的能力，它不仅能提高我们古典文学的修养，也是激发我们爱国主义热情，增强民族自豪感的好教材。

一、楚辞——战国时期楚国出现的新体诗

楚辞是继《诗经》之后出现于楚国的一种新体诗。其句式参差错落，文辞瑰丽奇幻，可说是当时的自由诗。它的出现不是偶然的，而是有其时代和地理环境的必然因素。梁启超说：

那时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伟大的文学？为什么不发生于别国而独发生于楚国？何以屈原能占有这首创的地位？第一个问题，可以比较的简单解答，因为当时文化正涨到最高潮，哲学勃兴，文学也该为平行线的发展，内中如庄子、孟子及战国策中所载各人言论，都很含着文学趣味，所以优美的文学出现，在时势为可能的。第二第三两个问题，关系较为复杂，依我的观察，我们这华夏民族，每经一次同化作用之后，文学界必放异彩。楚国当春秋初年，纯是一种蛮夷，春秋中叶以后，才渐渐的同化为“诸夏”。屈原生在同化完成后约二百五十年，那时候的楚国人，可以说是中华民族里头刚刚长成的新分子，好象社会中才成年的新青年。从前楚国人，本来是

最信巫鬼的民族，很含些神秘意识和虚无理想，象小孩子喜欢幻构的童话，到了与中原旧民族之现实的伦理的文化相接触，自然会发生出新东西来，这种新东西之体现者，便是文学。（《饮冰室合集·屈原研究》）

鲁迅也认为：

《离骚》之异于《诗》者，特在形式藻采之间耳，时与俗异，故声调不同；地异，故山川神灵动植皆不同。……楚虽蛮夷，久为大国，春秋之世，已能赋诗，风雅之教宁所未习，幸其固有文化，尚未沦亡，交错为文，遂生壮采。……《离骚》产地与《诗》不同，彼有河渭，此则沅湘，彼惟朴椒，此则兰茝；又重巫，浩歌曼舞，足以乐神，盛造歌辞，用于祀祭。……（《汉文学史纲要》）

他们都说明了楚辞产生与时代和地理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。

楚辞的句式，以五言和六言为主，而又长短不齐，多用虚字，篇幅加长，少则数十字，多则两千余字，能够表现丰富的思想内容和复杂的感情变化，体制上的自由解放，适应了时代发展的需要。

楚辞是楚国之歌，与楚国的音乐民歌有血缘关系，其中的“兮”字，就是楚地民歌习用的虚词，相当于现代汉语的“啊”字，具有抒情性与歌唱性。很多作品的结尾部分，都有“乱”字，就是乐曲尾声的意思。个别作品还有“倡曰”（领唱的意思）、“少歌”（小合唱的意思），都保留了歌唱的痕迹。西汉初就有专门用楚声来诵读楚辞的专家，他们都因善言楚辞而得到了皇帝的欢心。《史记·酷吏列传》曰：“买臣以楚辞与助俱幸。”《汉书·朱买臣传》曰：“严助贵幸，荐买臣，召见，说《春秋》，言《楚辞》，帝甚悦之。”《汉书·王褒传》：“宣帝时，……征能为楚辞之九江被公，召见诵读。”一直到隋朝，还有僧道骞“能为楚声”，以“音韵清切”（《隋书·经籍志》）的声调来诵读楚辞。本世纪初发现的敦煌残本《楚辞音》就保存了道骞的部分读音。到了唐朝以后，楚辞特有的读法才失传了。总

之，楚辞的特点就是“书楚语，作楚声，纪楚地，名楚物”（《楚辞书目五种》引黄伯思《校定楚辞自序》）。

楚辞的作品最初是由西汉刘向编集的，并正式定名为《楚辞》，原为十六卷，末了一卷是刘向自己的仿作。到了东汉的王逸，就根据刘向的本子作了注解，他也加上一篇自己的仿作，扩为十七卷，内收屈原、宋玉、景差和汉代的贾谊、淮南小山、东方朔、严忌、王褒、刘向、王逸等十家的作品。后来刘向的本子失传了，王逸的《楚辞章句》就成为流传至今的最早的注本。从王逸以后，为楚辞作注者很多，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南宋洪兴祖的《楚辞补注》、朱熹的《楚辞集注》、清王夫之的《楚辞通释》和蒋驥的《山带阁注楚辞》等，其中朱熹的集注简明扼要，对于自学者来说，尤为适宜。

二、楚辞的代表作家——屈原

楚辞是和屈原的名字紧紧联在一起的。屈原是楚辞的第一位也是最主要的作家，楚辞这种新体裁是他在学习楚国民歌的基础上完成的。

（一）屈原的生平

屈原，名平，字原，约生于公元前三四〇年，与楚王同姓，出身于贵族之家。他的生活约可分为三个时期。

第一时期是楚怀王十六年屈原二十八岁以前。

关于屈原的生日，诗人自己提供了可靠的线索。《离骚》开头说：“摄提贞于孟陬兮，惟庚寅吾以降。”说自己诞生于寅年寅月寅日。由于具体的计算方法的不同，这寅年寅月寅日究竟是哪年哪月哪日，说法纷纭。推算出来最早的年份是楚宣王十七年（前353年）正月二十三日（胡念贻《屈原生年新考》），最晚的推为楚威王五年（前335年）正月初七日（林庚《诗人屈原及其作品研究》）。郭沫若推为楚宣王三十年（前340年）正月初七日（《屈原研究》），浦江清推

为楚威王元年（前339年）正月十四日（《屈原生年月日的推算问题》）。郭、浦两说相差一年，似较为可取。

屈原年轻有为，“博闻强志，明于治乱，娴于辞令”，因而得到了怀王的信任，担任左徒之职，这是地位仅次于令尹（楚国的国相）的官职。怀王委以内政外交大任，“入则与王图议国事，以出号令；出则接遇宾客，应对诸侯，王甚任之”，屈原发挥了他的政治才能，干得有声有色。但是在怀王十六年时，楚国的形势却急转直下，本来十分生动的政治局面顿时改观了。

当时战国七雄中，秦国据有殽函之固，自孝公实行商鞅变法以来，经过几代的努力，兵强马壮，国势蒸蒸日上。比屈原稍后的荀子曾在《强国篇》中写下了入秦见闻，归纳秦国的强大表现在五个方面，认为它具有“形胜”的优势，地形险固，得天独厚；人民为“古之民”，风俗古朴；官吏为“古之吏”，百吏肃然忠信，忠于职守；士大夫特出秉公，是“古之士大夫”；朝廷办事效率高，百事不留，是“古之朝”。因此他得出结论说：“故四世有胜，非幸也，数也。”指出秦国的强大不是偶然的，而是必然的结果。另外，占有渔盐之利的齐国物产富庶，经过威王的改革，国力强盛；宣王则扩大稷下学宫，吸收了文学游说之士数百千人，一时人文鼎盛。至于楚国，则掩有江汉流域，疆域辽阔，人口众多。这三国各有自己的长处：秦强，齐富，楚大。在从分裂走向统一的历史趋势中，它们都具备了统一天下的条件，关键就在于谁能制定、执行正确的路线政策。从实力来看，秦国是强大的，但齐楚如果联合起来，也是能够与之抗衡的。当时就有“横则秦帝，纵则楚王”的说法。屈原在左徒任内，就是坚决采取联齐抗秦的策略的。楚怀王熊槐即位初年是想做一番事业的，他曾攻灭越国，把楚国的版图扩大到了东南沿海；他信用屈原，曾经参加反秦的合纵联盟，一度是六国的纵约长；十一年六国也曾出兵攻秦，虽然后来六国兵至函谷关即引归，没有什么结果，但毕竟表现出抗秦的勇气。这时的楚怀王头脑还是比较清醒的。秦国深知拆散齐楚联盟就能收

各个击破之效，也知道楚怀王是贪图小利、没有远大眼光的人，于是就在怀王十六年，派了张仪使楚。张仪以他三寸不烂之舌，约楚绝齐，许以商于(wū)地六百里。怀王果然为商于六百里地所动，忘了联齐抗秦的根本利益，他甚至惟恐绝齐行动不够决绝，还“使勇士往骂齐王”（《战国策·秦策·齐助楚攻秦》），派人去当面辱骂齐王。可是当知道张仪的所谓六百里商于地原是一个大骗局时，他却又出于暴怒而轻举妄动，在准备不足、没有外援的情况下，贸然发兵攻秦，终于大败。

也就在十一年至十六年之间，朝中的上官大夫出于忌妒，更由于维护旧贵族既得利益的阴暗心理，要夺取屈原正在起草的宪令，遭到了屈原的断然拒绝，于是便对屈原肆意攻击，在怀王面前说屈原自夸其能，不把楚王放在眼里，怀王勃然大怒，就此疏远屈原。

怀王十六年是关键性的一年。对于怀王来说，前此他能够任用屈原，委以内政和外交大任，能够坚持联齐抗秦的路线，因此楚国还是富有生气的；可是他终于内惑于郑袖，听信上官大夫的谗言，贬抑屈原，外见欺于张仪，撕毁了联齐的盟约，把原来与屈原共同制定的“国富强而法立”（《惜往日》）的开明政治变为“背法度而心治”（同上）的黑暗局面。楚国也就从这一年开始，滑向衰落的道路。

第二个时期是怀王十六年至怀王三十年，屈原二十九岁至四十二岁时。这期间屈原于怀王十八年曾出使齐国，而当时秦国准备与楚国讲和，要把十六年夺走的汉中地的一半还给楚国，但怀王却不要汉中地，宁要得到张仪。张仪有恃无恐地到了楚国，通过靳尚和郑袖说动怀王而得到了释放。张仪刚被放走，屈原从齐国出使回来，极劝怀王应杀掉张仪。怀王后悔，赶快派人去追，然已追赶不及。可见十六年后屈原虽被疏远，还是担任了使齐的外交重任。大约秦楚关系恶化之时，就需要屈原为使，与齐通好；反之，秦楚交欢，则坚持抗秦的屈原就要被冷落。

屈原在怀王十八年至三十年之间有哪些事迹，史无记载，《渔父》中说到屈原曾为三闾大夫。王逸说：“三闾之职，掌王族三姓，曰昭、屈、景，屈原序其谱属，率其贤良，以厉国土。”（《楚辞章句》卷一）这是管理、教育贵族子弟的并无实权的闲职。那么，他究竟哪年任为三闾大夫，确切年份无可考，但在这个期间似无问题。《离骚》中说：“余既滋兰之九畹兮，又树蕙之百亩。畦留夷与揭车兮，杂杜蘅与芳芷。冀枝叶之峻茂兮，愿俟时乎吾将刈。”这大约就是描写诗人在三闾大夫任上辛勤培育人才，希望他们成为振兴楚国的栋梁的情景。可是结果怎样？“兰芷变而不芳兮，荃蕙化而为茅。何昔日之芳草兮，今直为此萧艾也。”他亲手培养的人才变质了，这使他极为痛心。

三十年，秦昭王邀怀王会于武关（今陕西丹凤东南），屈原竭力劝阻，而怀王小儿子子兰则怂恿怀王赴会，怀王终于去了。不料到了武关，便被秦兵断绝了归路，秦昭王要挟怀王割地，怀王断然拒绝，逃到赵国，但赵国不予接纳，怀王只好回到秦国去，终于病死于秦。

在怀王时期，屈原是否被放逐过，说法不一。揆之情理，似无放逐可能。十六年左右，上官大夫在怀王面前诋毁屈原，怀王仅止于“怒而疏屈平”，不见得为了屈原自伐其功就要流放他；何况十八年屈原还担当了出使齐国之任。清人林云铭说：“大约先后被谗止是疏，本传所谓‘不复在位’，以不复在左徒之位，未尝不在朝也，故有使于齐及谏释张仪二事。”（《楚辞灯·九章总论》）他的解释是合乎情理的。至于二十四、五年之时，秦楚结盟，屈原肯定是坚决反对的，一般都认为屈原放逐当在此时。但这属于猜测，并无事实根据。很可能屈原在谏劝绝秦无效后，愤而自疏，跑到了汉北。《离骚》所写的“吾将远逝以自疏”，《抽思》“有鸟自南兮，来集汉北”，就是描写这种情况。到了二十九年，楚“乃复使太子质齐以求平”，齐楚又联合了，那使者很可能便是屈原。不能因为齐楚决裂、秦楚订盟，便以为怀王就要放逐他；而齐楚联合、秦

楚交恶便又把他召回。对屈原来说，怀王对他“怒而疏”，这就是沉重的打击和惩罚了。《离骚》中写道：“初既与余成言兮，后悔遁而有他。余既不难夫离别兮，伤灵修之数化。”说的就是怀王这种忽而联齐，忽而盟秦，有时要他出使齐国，有时又把他撇在一边的反复无常的态度。

第三个时期是在顷襄王时。当怀王三十年入秦不返之时，怀王太子自齐归国立为王，是为顷襄王，用其弟子兰为令尹。子兰因为劝怀王赴会以致怀王客死异国而受到了国人的谴责，又听到屈原对他表示不满，便老羞成怒，通过上官大夫在襄王面前进谗言，襄王便“怒而迁之”，把屈原放逐出去，贬谪到江南蛮荒之地。这说明襄王昏庸腐朽超过乃父，即位后非但不贬斥谗人群众小，反而对他们言听计从，把忠心为国的屈原毫不留情地加以放逐。本传中写到放逐的文字是这样的：

长子顷襄王立，以其弟子兰为令尹，楚人既咎子兰以劝怀王入秦而不反也。屈平既嫉之，虽放流，眷顾楚国，系心怀王，不忘欲反，……令尹子兰闻之，大怒，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于顷襄王，顷襄王怒而迁之。

这里的“放流”同下文的“迁”是否同指襄王时的放逐，或别有所指，确实比较模糊，容易产生不同的理解，因此有人据此以为他在怀王时被放逐一次，襄王时又被放逐一次，是两次流放的证明。我们细详文意，“放流”二字似与上文三十年谏阻武关事不合。屈原当时谏阻怀王，怀王不听，但也没有放逐屈原之理，文中更无一字提及，恐怕这“放流”就是指襄王时的放逐而言，是襄王即位后听信谗言，立即把屈原贬逐出朝。从“长子顷襄王立”至“怒而迁之”之间，文意贯串，并无间隔，其时怀王仅仅为秦所拘，并未死去，顷襄王即使为王，而屈原尚存有怀王归国的希望，故云“虽放流，眷顾楚国，系心怀王，不忘欲反，冀幸君之一悟，俗之一改也。”这段文字的后面所说令尹子兰“大怒”，唆使上官大夫进谗，襄王“怒而迁之”等等，这是采用倒叙的笔法来交代事情的经过罢了。

屈原被襄王放逐到了江南沅湘之间，过着穷愁忧闷的流放生活，把他的遭遇和思绪都熔铸在楚辞的创作中。同时，他无时无刻不在继续关注着国事。当襄王二十一年，秦将白起攻破楚国首都郢城时，屈原痛彻肝肺，仰首执问“皇天之不纯命”（《哀郢》）。热爱祖国胜于生命的屈原，面对祖国的危亡和“变白以为黑兮，倒上以为下”（《怀沙》）的黑暗政治，本着“鸟飞返故乡兮，孤死必首丘”（《哀郢》）的精神，他便“不毕辞以赴渊”（《惜往日》），赴身长流，自沉汨罗，以身殉国。据说这一天是夏历五月初五端午节。这原是民间的一个节日，因为人民热爱为国殒身的诗人，便把这一天作为诗人专有的忌日了，人们用裹粽子、划龙舟等行动来寄托对伟大的爱国诗人的崇敬和怀念。

（二）屈原作品的真伪

屈原的作品，据《汉书·艺文志》记载，有二十五篇，它们是：《离骚》《天问》《招魂》《卜居》《渔父》《远游》《九歌》（包括《东皇太一》《云中君》《湘君》《湘夫人》《大司命》《少司命》《东君》《河伯》《山鬼》《国殇》《礼魂》等十一篇。最后一篇《礼魂》，一般认为是其他十篇的共同结尾，故可以不计篇数）《九章》（包括《惜诵》《涉江》《哀郢》《抽思》《怀沙》《思美人》《惜往日》《橘颂》《悲回风》等九篇）。我们将选择其中的代表作进行注析。这里需要谈的是这些作品的真伪问题。

《离骚》《天问》《九歌》为屈原所作是公认的，不成问题，其他的篇章还存在不同的看法。

《招魂》一篇，王逸在章句中把它当作宋玉的作品，这是不对的。早在本传中，司马迁就说：“余读《离骚》《天问》《招魂》《哀郢》，悲其志。”他的话是可信的。再从作品内容来说，《招魂》写了“宫廷居处之美，饮食服御之奢，乐舞游艺之盛，不是一个君主是不能够相称的”（郭沫若《屈原研究》）。这是屈原为招回怀王客死于秦的鬼魂而作。

对《远游》篇的怀疑颇多。清人吴汝纶说：

此篇殆后人仿《大人赋》托为之，其文体格平缓，不类屈子，世乃谓相如袭此为之，非也。辞赋家辗转沿袭，盖始于子云、孟坚。若太史公所录相如数篇皆其所创为，武帝读《大人赋》，飘飘有凌云之意，若屈子已有其词，则武帝闻之熟矣。若夫神仙修炼之说，服丹度世之旨，起于燕齐方士，而盛于汉武之代，屈子何由预闻之？（《古文辞类纂评点》）

吴汝纶从三个方面提出疑问。第一是风格问题，他认为《远游》的风格与屈原其他作品的风格不同。我们试从体裁、表现手法以及语言运用等来比较，就可以看到本篇与《离骚》的风格是一致的。《远游》中所写的神游仙境、追求轻身，与神仙为伍，这是愤世嫉俗的曲折表现，并非真的去追求长生道术；而轻举远游的意思在《离骚》中已露其端倪；如饮露餐菊、历览四荒、神游西方等等，本篇则是以此为中心，予以充分的发挥，同样运用浪漫主义的丰富想象来写轻举远游的情景。同时本篇也与《离骚》一样，用六字句与参差不齐的杂言相间的语言形式来写。本篇的基本格调与诗人的其他作品并无相悖之处。

第二是谁仿效谁的问题。吴汝纶认为汉武帝读到《大人赋》就有飘飘然的感觉，说明他过去并未读过《远游》，是第一次读《大人赋》，所以才会感到新鲜。武帝是否读过《远游》是一回事，屈原是否写过《远游》是另一回事，不能混为一谈，怎么能因为后人没有读过前人的作品，就来否定前人作品的真实性呢？何况武帝是否读过《远游》，也还是一个未知数呢！

第三是游仙思想问题，吴汝纶认为它流行于燕齐之间而盛于汉武帝之时，屈原不可能具有这种思想。这恐怕并不尽然。诚如他说，方士仙家多活动于燕齐之间，但屈原恰恰是能够与之接触的。他曾数度出使齐国，对于人文荟萃的稷下学宫当不会置之不顾，对于各派学者以及他们的思想肯定会下一番功夫去接交研

究。作为“博闻强志，明于治乱，娴于辞令”的政治家，想来是不会放过这么一个增长见闻，交流学术思想和探讨治国方略的机会的。梁启超认为“他又曾经出使齐国，那时正当‘稷下先生’数万人日日高谈宇宙原理的时候，他受的影响当然不少”（《屈原研究》），道家思想难免要影响他了。再说，楚国正是道家思想的故乡，它的创始人老子就是楚国人，著有道德篇五千言。环渊是老子的学生，也是楚国人，曾在稷下学宫讲学，著有上下篇。他们的著作和思想在楚国不会不产生影响。而道家另一位代表人物庄子虽是宋人，但与楚国却有一定的关系，那就是楚威王曾经礼聘庄子为相，被庄子拒绝了。这说明老庄思想在楚国有着广泛的影响，否则楚威王是不会重金礼聘庄子的。庄子早于屈原三十多年，屈原对他当然是熟悉的。这样看来，《远游》中直接引用老子和庄子的语言就不是偶然的了。

至于《卜居》和《渔父》两篇，清人崔述怀疑它们非屈原自作，而是后人伪托；近人也有断定其为伪作者。他们的理由是：古代凡用第三者口气来写者多非本人所作，而这两篇是用第三者的口气来写的；《离骚》《九章》诸作都是韵文，而它们却是散文体。这些似难构成充足理由来推定它们为伪托。前人没有的东西总有第一个人出来大胆创造的，楚辞这种与《诗经》迥异的新诗体不就是屈原所创造的吗？《离骚》这样的长篇巨制不就是前无古人的创作吗？能够写作《离骚》的屈原难道就不能再进一步写出介乎诗与散文之间的《卜居》与《渔父》吗？何况这两篇的某些表现手法在《离骚》中就已具有了。女媭、灵氛和巫咸都是诗人虚构的寓言式人物，诗人通过与他们问答进而写出内心的矛盾和斗争。寓言问答是先秦散文常用的表现手法，屈原将某些散文笔法用到自己的辞赋中，在《卜居》《渔父》中则更通篇采用寓言体来写。詹尹和渔父都是虚构的人物，诗人把诗歌与散文结合起来，形成了一种新的体裁。这就是后来宋玉与荀子正式以赋名篇的赋体作品，没有《卜居》和《渔父》，恐怕就不会有宋玉的《风赋》和荀子的《赋篇》等作品吧。

还有《九章》中的《悲回风》和《惜往日》两篇，也颇有疑为伪作者。《悲回风》结尾处有这样的诗句：“望大河之洲渚兮，悲申徒之抗迹。骤谏君而不听兮，任重石之何益。”诗人批评申徒狄因谏君不听而投水自杀是无益的行动。否定者便认为屈原既然指责投水自杀是无益的行动，而他自己为什么会自沉汨罗呢？可见批评申徒狄的《悲回风》是伪作的了。其实这个理由也不是充分的。屈原确是仿效彭咸和申徒狄，最后赴身长流，但他在自沉前是有过思想变化的。他迟至襄王二十一年国都残破时才下定了死的决心，在前此漫长的流放岁月里，可说是始终处于激烈的思想斗争之中。不是国都残破，他也未必会采取这个决绝的行动。他对国君始终抱有希望，但愿国君能回心转意，改弦更张，疏小人而亲贤臣，所以作品中总是表现他“存君兴国，而欲反覆之，一篇之中，三致志焉”的强烈愿望，等到郢都陷落，他才痛心于国家之破灭，君王之不悟（《惜往日》：“惜壅君之不识”），感到绝望而毅然自沉。如果没有激烈的思想斗争，他恐怕早在为谗人诽谤诬陷、遭到怀王疏远时就要自杀了。

还有《惜往日》，怀疑者以为它语言浅显而语气愤激，似第三者为同情屈原而作。实则本篇为诗人最后的绝命词，他在自沉前总结个人一生的遭遇，又一次表明自己对谗人乱国误君的黑暗政治的痛恨，决心以一死殉国，在语言上确有浅显激切的特点。如“临沅湘之玄渊兮，遂自忍而沈流。卒没身而绝名兮，惜壅君之不昭。”“宁溘死而流亡兮，恐祸殃之有再，不毕辞以赴渊兮，惜壅君之不识。”清蒋骥认为：“临死而抚今追昔，不禁号呼也。”（《山带阁注楚辞·余论下》）“九章惟此篇最浅易。非徒垂死之言不加雕饰，亦欲庸君入目而易晓也。”（同上卷四）他的分析极为中肯，说明本篇的两个特点是由于决心自沉无暇雕饰，而内心悲愤之情不禁喷薄而出所形成的。结合诗人当时的处境与心情来分析，本篇语言上的这些特点便不难理解了。

对于历史上相传为屈原的作品，在缺乏充分证据的情况下，不

应轻易地加以否定。闻一多说得好：

凡古代相传之事实，在无人提出反证，或所提之反证并不充足时，吾人只得暂时承认传说为不误，或至少为“事出有因”。（《社会科学战线》1981年1期《闻一多论〈九章〉》）

对于屈原的作品，还是采取慎重的态度为妥。

按照语言的不同形式，屈原的作品大致有如下几种：以四言为主，如《天问》《招魂》；以五言为主，如《九歌》；以六言为主，如《离骚》《九章》诸篇；韵散相间，如《卜居》《渔父》。

他的四言句式的作品还可以看到《诗经》的影响，而《离骚》和《九章》诸篇则完全是屈原的创造，它以特有的风貌构成了楚辞的特点。《卜居》《渔父》的散文体赋则是屈原吸收诗歌与散文的表现方法写就的，是赋体的滥觞，后经过宋玉及荀子的实践和发展，便正式形成了“赋”这种文学样式，到了汉代，便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，终于蔚为大国而风靡于文苑了。

（三）屈原辞赋的艺术特色与成就

屈原的辞赋是思想性和艺术性和谐地统一的，既具有深广的思想内容，又有着震撼人心的艺术力量，能使读者受到强烈的感染。

首先，屈原的辞赋是浪漫主义的。《诗经》中的篇章是现实主义的，基本上按照现实的本来面貌反映社会现实，但也有一些具有浪漫主义色彩的篇章。如《魏风·硕鼠》篇的“逝将去汝，适彼乐土，乐土乐土，爰得我所。”表现了对残酷剥削的反抗和对于没有剥削、压迫的“乐土”的向往，就有浪漫主义的成分，但这类作品不多。而屈原的作品，则浪漫主义精神贯串始终，表现为对理想对真理的执着的追求和喷薄而出的热烈的爱憎。他为了改革政治，愿为王前驱，做一名开路先锋：“乘骐骥以驰骋兮，来吾导夫前路”；“路曼曼其修远兮，吾将上下而求索”。当他遇到恶势力的阻